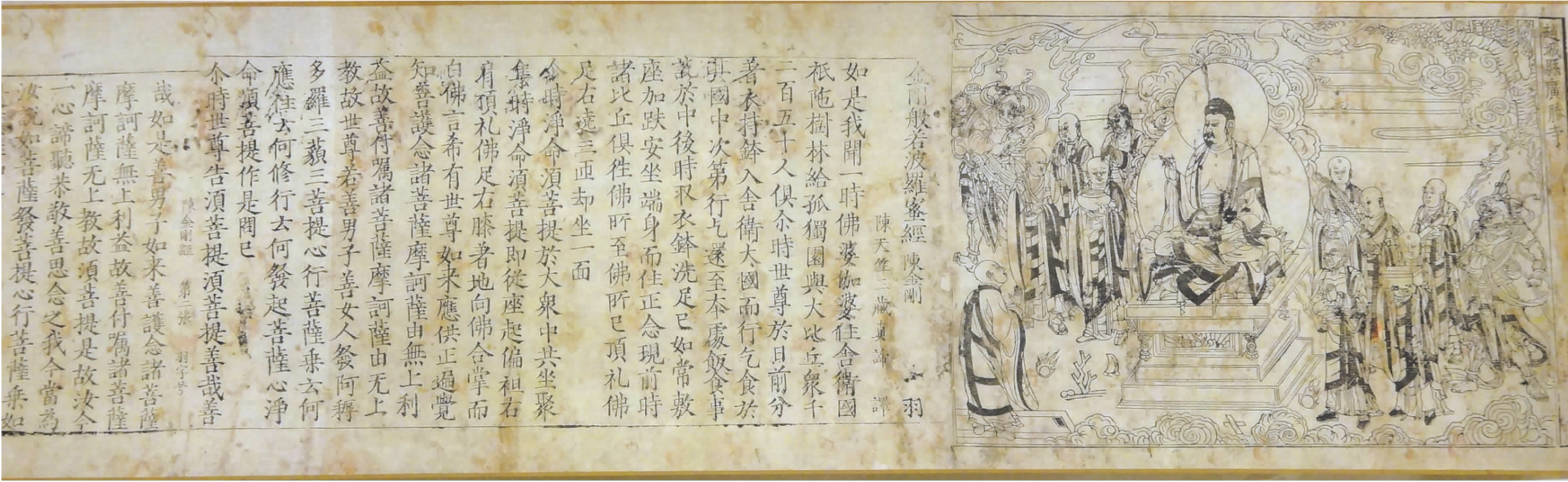


赵城金藏 今始“重归”广胜寺

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



《赵城金藏》扉画及经文。
本报记者 郑蔚摄

为纪念《赵城金藏》抢运保护 75 周年，前天，临汾隆重举行首批百卷《赵城金藏》回归广胜寺捐赠仪式系列活动。

《赵城金藏》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，与《永乐大典》《四库全书》《敦煌遗书》一起被誉为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的“镇馆之宝”。从去年 3 月起，临汾市启动了为期五年的《赵城金藏》复制工程，运用现代科技结合传统工艺，对国图馆藏《赵城

“松柏参天，殿宇雄伟，佛像庄严。五彩壁画，艺术惊人，惜为不肖者刮卖，仅存壁架残余。‘上寺’距其寺（下寺）四里山腰，遥见林木中高耸释迦牟尼佛舍利塔，装以绿色琉璃瓦，八角十三级层角造有天龙八部护法神像，飞舞活泼，行色各异，端悬钟铎，每风至，声闻数里，循声登石级而达上寺。”

这是 1933 年夏，高僧范成法师来到山西洪洞县赵城镇附近的霍山南麓的广胜寺，留下的笔记。

相传广胜寺建于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东汉建和元年（147），当时称阿育王塔院。唐大历四年（769），代宗皇帝李豫敕建重修，并赐额“大历广胜之寺”，意为“广大于天，名胜于世”。而它在中国佛学史上的特殊贡献，不仅在于其建筑群落布局严谨，造型别致，飞虹宝塔璀璨夺目，更重要的是它还曾珍藏护佑了举世无双的《赵城金藏》。

九死一生，《赵城金藏》重见天日

“《赵城金藏》的发现，对世界佛学的意义非常重大。佛教发轫于印度，但全世界佛教早期典籍保存得最多的却不是印度，而是中国的汉译本。”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部，研究《赵城金藏》几十年的研究馆员李际宁先生向记者娓娓道来，“汉译佛典绝大部分是东汉至隋唐时期译成的，我国第一部木刻版的汉文大藏经在北宋开宝年间（公元 971-983 年）在成都雕刻完成，它采用千字文编次顺序，共五六千卷，卷轴式装帧，数千万字，这可能是人类在公元十世纪之前最早最庞大的一部佛教丛书，史称‘开宝藏’。但迄今为止，‘开宝藏’全世界只剩 12 卷，美国 1 卷、日本 2 卷、中国 9 卷。相对‘开宝藏’五六千卷的总量而言，存世者仅为只鳞片甲。”

北宋以来，中国历朝皆有整理雕印佛教大藏经的传统。“佛法强调‘三宝崇拜’，就是对佛、法、僧三者的供奉，僧是指佛僧，僧是指僧人，法就是大藏经及舍利等。但到民国初年，因为战乱等各种原因，宋元明以来的各藏不仅经板早已毁灭殆尽，就是印本，也仅存零卷零本。国内比较完整的大藏经板，仅剩‘乾隆藏’一副经板，但因残缺、混乱，如不斥巨资和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予以重新修版，几乎没有再使用印刷的价值。”李际宁说，“当时，寺院和学术界都痛感缺乏大藏经，于是开始到民间‘寻觅古经’。”

1930 年，陕西大旱。时任“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”的朱庆澜将军在陕西意外地发现了颇为罕见的宋元版《赵城金藏》，于是发起组织“影印宋版藏经会”，打算筹款影印《赵城金藏》。但藏经会很快发现，缺卷太多，用行款相同的大藏难以补齐。1931 年，藏经会召开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，增补范成法师和黄赞熙为常务理事，并提出将《赵城金藏》从西安借到上海去拍照。

于是，范成法师开始在晋、陕地区调查古本大藏经。1932 年九十月间，

金藏》进行 1:1 原貌复制，每卷复制 3 件，1 件回归广胜寺，1 件入藏即将建成的临汾市图书馆，1 件回赠出资单位或个人。

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在捐赠仪式上指出，临汾采用政府组织、民间助力的方式，通过高仿制作重现《赵城金藏》面貌，是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重要实践，是保护、传承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山西省文化厅副厅长张健认为，此复制

发展的结晶与载体，但它又不仅限于佛经，是在佛教篇目体系下，涉及哲学、历史、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天文、历算、医药、建筑、国际关系等领域的‘百科全书’。已故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所长、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老先生认为，《赵城金藏》已超越‘国宝’，属世界文化遗产。”

1982 年，国家组织出版《中华大藏经》（汉文部分）正编，就是以《赵城金藏》作底本，按《赵城金藏》的目录体系，重新编辑影印。可见《赵城金藏》对中华文化的重大贡献。

但令人遗憾的是，记载主持《赵城金藏》刊雕的比丘尼崔法珍事迹的资料已随《大元一统志》《析津志》等典籍的亡佚而流散，而最初记录崔法珍刊雕此藏的原始数据——赵凤碑，也在明代中期湮灭于世。蒋唯心曾说过：“明昌四年赵凤为崔法珍撰碑当有记载，惜有明以来，碑石久毁，无足征也。”

上世纪 90 年代，李际宁在研究国图收藏的《赵城金藏》的《大宝积经》卷第二十九的时候，在卷末题记中发现了崔法珍刊雕《金藏》的碑文；2016 年他又对山西绛县太阴寺发现的《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》进行了研究考证，于是梳理出了《赵城金藏》的来龙去脉：

“潞州长子县崔氏童女名法珍”，断臂出家，号召信众三千余人，化缘众筹。这部大藏经版虽有多处藏院合作，但组织者崔法珍，由崔在山西运城天宁寺雕造大藏经版，历时二十余年。经版雕成后，表奏朝廷，并进献经板，世宗皇帝“敕降童女菩萨以为弘教大师”。可惜的是，此经板在元代中期被毁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在忽必烈进了大都（今北京）还没有将国号改为“元”（史称“蒙古时期”）之时，广胜寺僧人已到大都的寺庙重印了这部大藏经，虽然目前已难以考证究竟是大都的哪座寺庙完成了印制的壮举，但为这部古藏留下真迹而功德无量。这部大藏印好后，运回山西临汾广胜寺装潢，加装卷轴和扉画。此扉画为首创，据专家考证，“开宝藏”中并无扉画。扉画的卷端，题有“赵城县广胜寺”，并珍藏广胜寺，在霍山上的暮鼓晨钟里默默度过八百六十多年时光。

日前，记者来到临汾，在临汾地图上却找不到“赵城县”，其下辖的县市中只有洪洞县、赵城镇。洪洞县的广胜寺文管所副所长段建凤告诉记者，上世纪 50 年代，当地行政区划调整，赵城县与洪洞县合并，赵城县县城原址改称“赵城镇”。

走进位于霍山的广胜寺上寺，前殿中间供奉着多尊佛像，既有铜铸，亦有泥塑。四壁放置着 10 个似乎不起眼的 4 开门的藏经柜，其中高的有近 2 米，宽也有近 2 米。岁月已经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斑驳的光影。

三面是敌，英雄虎口抢金藏

上世纪 30 年代，《赵城金藏》重现于世，海内外为之震惊。蒋唯心的《金藏雕印始末考》一发表，就引起日

工程是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。

走过八百多年历史风云的《赵城金藏》，它和临汾有着何种历史渊源？它对中国佛教事业有何重大意义？75 年前，八路军又是如何为之浴血牺牲的？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文博工作者又是如何修复和妥善保存《赵城金藏》的？日前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专家和山西临汾的文物保护工作者，为记者讲述了这穿越时空的感人故事。

在兴唐寺的可能性较大，于是派员游击大队长徐芳生去兴唐寺调查，扑了个空，才知道经书在广胜寺。

李溪林于是带徐芳生和警卫员赶往广胜寺，当他们向往持力空和尚说明来意后，力空面露难色，说：“太原失守前，一战区卫立煌中央军的一个中将军长亲自来找我要经，我没给。太原沦陷后，二战区阎长官派个师长来要经，我也没给……”经李、徐两人晓以大义，力空和尚深思后说：“要可以，但只能亲手交给朱总司令。”

“七七事变”至 1938 年春，八路军总部与朱总司令曾在赵城县马牧村住过，在当地影响很大。李溪林劝力空和尚说，朱总司令在千里之外的太行山，等把书运到根据地，再让朱总司令的秘书写个借条送回来。力空和尚这才最终同意。

当时广胜寺的东北方向通往抗日根据地，而西北 30 里的赵城县有日军一个中队、西南洪洞县城驻有日军一个大队，正南 15 里的苏堡镇有日军一个小队。因此抢运任务由地委机关干部、军分区基干营一连和洪洞、赵城两个县大队在夜间执行。那时，经书已经藏到飞虹塔二层佛空心的体内，由部队入寺取经，当晚 12 时左右将经书全部安全运出，由赵城二区干部群众牵驴运输。据老前辈回忆，在撤退的过程中，曾与日军发生交火，有多名战士牺牲。但我军没有恋战，将经卷直接运到根据地内安泽县的亢驿村，当时这里是二地委的机关所在地。

当时，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，物资相当匮乏，纸张更为稀缺。有个别战士不懂经卷的价值，将经卷引首的空白处剪下钉成本子用。史健知道后痛心地说：“无知、无知、太无知了！这纸相当于宋纸，都是宝物很珍贵，谁再损害要受纪律处分！”

八路军就这样保住了《赵城金藏》。在反扫荡中，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，又有很多战士为保卫经卷而壮烈牺牲。

时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（曾任轻工部副部长），在回忆中说道，在军情如此紧急的情况下，史健能慧眼识珠地想到抢运和保护这稀世珍宝，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，真是为中华民族立了一大功。

纸寿千年，百废待兴救“金藏”

《赵城金藏》虽未落入敌手，但状态并不乐观。“大概有三分之二成‘炭棍’了”，在北京国图古籍馆的文献修复组，研究馆员杜伟生告诉记者，“因为在反扫荡转移中，有的经卷藏身煤窑里，霉菌和煤灰把一卷卷的藏都粘在一起，从外观上看就像一根木炭，硬得就像一根木棍，亟待整理修复。”

北平和平解放以后，1949 年 2 月，当时解放军尚未突破长江天险，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就请示中共华北局及华北政府并获批准，将《赵城金藏》移交给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（今国图的前身）保

管，可见共产党人对中华文化典籍何其重视。一个多月后，华北大学派员押送古藏到当时的北平。入藏北平图书馆以后，时任代馆长王重民和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对此非常重视，马上组织人手着手整理、修复这部珍贵的佛教经典。

是年 5 月 14 日，北平图书馆为此召开了首次为修复古籍而举行的研讨会，研讨修缮和保护方案，并由此成为学术惯例。根据国图保存的座谈会会议纪要，座谈会由王重民主持，北京图书馆著名版本学家赵万里、运送《赵城金藏》的张文教、巨赞法师和范文澜、晁哲甫、于力、马叔平、韩寿萱、周叔迦、向达等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。会议通过了赵万里先生提出的整旧如旧“保存原样”的修复原则。当时百度待兴，尚未宣布建国，国力维艰，但依然决定增派修裱技工，以每人每月小米 180 斤为月薪，而装裱所需纸张则由巨赞法师、李济深副主席和其他社会名人向海内外华侨信众募资筹得。

次年 6 月，巨赞法师募捐广西沙纸已经运抵北京。至此，修复《赵城金藏》的用纸准备完毕。

“修复《赵城金藏》最难的是什么？”记者请教杜伟生。

“难度就在‘揭’，只要能把粘结在一起的经文揭开，一半任务就完成了。”杜伟生说。

揭，按传统的手法，既有干揭，也有湿揭。“当时我们采用的办法是蒸揭，就是把经卷包上毛巾、外面再裹上纸，再搁在特制的笼屉里蒸。用水蒸气润一下，纸才能揭开，但不会破。如果揭到一半又揭不开，说明水蒸气还没有进到这一层，就再蒸，直到书页全部揭开为止。”

“您不是说经文上长霉了吗？这怎么办？”记者问。

“揭开了就洗，用水温在 90℃以上的清水漂洗。在洗去霉斑的同时，也杀死了霉菌。洗干净之后，再根据经卷本身的受损程度，决定是‘托’，还是‘裱’。后面粘一层纸、上墙绷平的叫托，粘两层纸的叫裱。全部修好了，最后再在经卷首尾两端加装天地杆。”

《赵城金藏》的修复从 1949 年 7 月开始，直到 1965 年修复工作全部结束，前后一共用了近 16 年的时间。“这是技术活”，杜伟生说，“我们请来参加过这一工作的，都是年龄在五十岁左右，原来就是在琉璃厂做古籍修复的老师傅。”

杜伟生向记者展示一件真迹影印的《赵城金藏》。记者用尺量了一下，扉画的尺寸是长 38 公分、高 28.5 公分；经文的尺寸是一页长 47 公分、高 28.5 公分不等。

李际宁先生告诉记者，在国图的精心保护下，《赵城金藏》在“文革”中躲过一劫，目前安然保存在国图的地库中。总数有 4813 卷，每卷都放在一个有编号的楠木盒子中，一个柜子存放 98 个盒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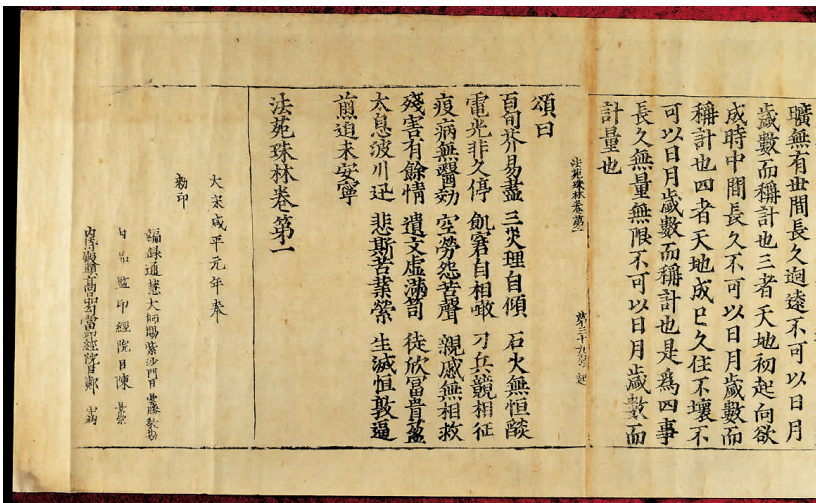
“纸寿千年，”杜伟生说，“只要这样好好保护，再放几百年、上千年应该没有问题。”



修复前的《赵城金藏》。



上世纪 50 年代，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《赵城金藏》。



修复后的《赵城金藏》。（除署名外，均国家图书馆供图）